

占社队干部的1.2%。

1958年11月29日

毛泽东主席针对反映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一封信，给中共河南省委写了指示信。

1958年12月1日，河南省委接到毛主席这封亲笔信后，立即组织由省委、许昌地委、长葛县委三级组成的调查组，赴坡胡人民公社，结合整社和与各方面有关干部、群众反复座谈，查证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经查证落实，该社从7月至10月中旬，共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160多起，其表现形式有辱骂、吊打、罚跪等，共惩罚448人，自杀未遂2人，逃跑的18人，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经县委研究决定，分别对6名干部作了处理，开除党籍法办处理的1人，留党察看2人，严重警告2人，警告1人。公社党委也总结教训向县委作了检查。1959年1月9日，省委就查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报告。

1959年3月11日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历时12天，到会的有县委、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干部，共计3597人。会议传达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解决“权力下放，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体制。会议通过讨论，统一了思想，研究确定了公社管理体制，即将原来18个人民公社，合并为11个人民公社，取消管理区，成立404个生产大队，1875个包工包产生产队，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1959年4月26日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到会2766人，历时6天，会议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关于人民公社清算账目的指示》。与会同志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算账的目的。会后，全县展开算账运动，11个公社分三批进行，到5月25日全部结束。通过算账，贯彻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惩处了那些贪污盗窃、

违法乱纪的干部。

1959年5月24日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许昌地委《关于对右派分子管理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意见》，对全县810名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进行了安排：（一）县建立对右派分子管理教育处理领导小组，由组织部长高风翔任组长，各公社指定一名党委委员具体负责，以政法部门为主吸收有关部门参加，成立3至5人对右派分子管理教育改造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二）认真贯彻政治监督和思想改造、生产劳动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原则，一月一集中学习，一季一评比，年终一总评，加强对其改造；（三）结合评审对悔改好的右派分子可及时摘掉帽子；（四）妥善解决右派分子的待遇和生活问题。

1959年7月22日

中共长葛县委对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省委《关于分配、整顿食堂、恢复自留地等几项情况的指示》进行了总结。总结指出：县、公社党委认真学习上级有关政策，提出贯彻执行的措施，由点到面，向群众宣传贯彻，目前已基本落实到队和社员。在整顿集体食堂中，共清出不纯分子27人，全县1975个食堂，按30户150人左右设一食堂，重新划分为2957个集体食堂，全县共分自留地52221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其中分给集体食堂耕种的25841亩，分给社员自种的26380亩。

1959年9月27日至10月11日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直科局长级干部、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等共62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八届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及《中共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在学习的基础上，普遍检查，互相揭发，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

1960年4月24日

中共长葛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安排好社员生活的几项决定》。《决定》指出：（一）从现在到接上新粮这一段时间内，每人每天保证吃到粮11两；（二）对浮肿病要书记挂帅，进行一次彻底普查，实行三集中、三照顾、三固定、三深入的规定，即严重的集中到公社或工作点治疗，一般的集中到大队治疗，轻微的集中到生产队治疗；照顾免费治病，照顾粮每天补助大豆2两，照顾劳动做到不恢复健康不参加劳动；固定一名干部管理，固定医生治疗，固定时间治好；深入检查病情变化，深入病床听意见，深入了解困难并及时解决；（三）每人保证有2分耕地的蔬菜；（四）转变干部作风，加强生活管理。

1960年5月8日

中共长葛县委针对一些集体食堂连续发生亚硝酸盐、坏红薯、杏仁、野菜等食物中毒29起425人，死亡17人的情况，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立即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1960年11月24日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全县人民群众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浮肿病蔓延的情况，组织医护人员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及疾病治疗。全县人民群众得到身体健康检查的达到426924人，占总人口的91.6%，得到治疗的17891人。

1960年11月26日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并提出保人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会议强调指出，要做好粮食管理，不购透底粮。号召大储干菜，大采野菜，大搞代食品。会议还作出了进行百日休整，半日劳动（工作），半日休息，浮肿病患者停止劳动（工作）的决定。

1960年12月3日

中共长葛县委布置开展民主补课运动，揭发批判干部中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特殊化）错误。之后县、社、队干部1142人，开始集中进行民主补课，历时3个月，使干部作风得到扭转。

（附：到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11650人。大牲畜也因饲料不足，死亡4750头。——摘自陈中岳：《回忆亲历的几件事》）

1961年4月10日至8月下旬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带领中央河南调查组在长葛县作农村调查。调查组先后到和尚桥公社及所属的宗寨、樊楼、杜村寺等生产大队，通过访问、座谈、分析，分别就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情况和公共食堂、粮食分配制度、劳动保护、社员家庭副业生产、“三包一奖”、“三定”、生产队的权限、调整社队规模、经营管理和一、二类社队整风等问题，写出了专题调查材料。习仲勋就在长葛农村调查的情况分别于4月23日和5月9日向邓小平和党中央作出两次书面报告。

1961年5月2日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在中共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长葛县也是“五风”严重的地方，特别是“共产风”刮得很厉害，丢掉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他要求县委要吸取以下方面的经验教训：（一）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十二条》政策，其中要做好退赔，把自留地分给群众，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退还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二）大队、小队规模可适当划小，便于生活和生产，好处很多，在平原不设区也可以，在分队的同时把三包一奖、四固定、分配制度、劳动生产管理等解决好；（三）公共食堂分散好，分散后，要具体帮助群众解决炊具、吃菜、吃粮等问题；（四）大办农田水利、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五）改进领导作风：1. 置身于群众之中。2. 确实给群众办实事。3. 去掉官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4. 坚持集体领导。5. 减少会议、报表、电话，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1961年6月11日

中共长葛县委甄别领导小组对前段复议平反工作进行总结。总结指出，自1957年以来全县在反右派、社教、反右倾、三类队改造、民主补课、拔白旗等历次运动和日常工作中处理的干部有5653人，占干部总人数的37.11%，其中需平反部分错误处理的1577人，占干部总数的27.9%，需平反大部分错误处理的1089人，占19.26%，需全部平反的1346人，占23.81%。对错误处理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有错必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1961年10月

根据历年负担情况，通过核实产量，上级调减长葛县农业税任务，由原来的2507万斤减为1128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生活困难。

1963年1月2日

中共长葛县委甄别领导小组作出《关于甄别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报告》指出，遵照上级甄别工作指示，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针”和“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错多少平多少，不错不平”的原则，从1961年3月到1962年4月底，连续开展了两批甄别平反工作，全县列入第一、二批甄别对象的12543人（其中有文字结论的1138人），已甄别范围有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教职员工、社员群众等，对民主革命补课、改造三类队中新划的“地富分子”也逐个进行了调查甄别。

1963年7月1日至15日

全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长葛县普查结果是：总户数105533户，总人口为510246人，农业人口501444人，占总人口的98.27%。

1963年6月7日

中共长葛县委向省、地委作出了《关于调整长葛县区划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长葛、洧川两县于1954年8月合并为长葛县。合并后的11年的实践证明，两县的自然条件、作物种植和经济基础悬殊很大。原长葛县人多地少、土地肥沃、水利灌溉条件好，原洧川县（特别是双洧河以北的4个区）地多人少，沙岗多（有13万亩），洼地多，历年来旱、涝、风、沙等自然灾害严重，收成极不稳定，产量很低，救济任务繁重。鉴于上述情况，县委感到几年来领导力量不能集中，不仅对西部生产抓得不透，粮食产量上去得慢，而且对东部的生产救济抓得也不突出，使东西部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县委认为长葛县的区划有必要再进行一次调整。调整方案有二：一是把双洧河以北的洧川、朱曲、岗李、大马等4个区，划归开封专区，并入中牟、尉氏等县，原洧川县的古桥、南席两个区在双洧河以南，土质与生产条件基本与原长葛相同，留在长葛县。二是恢复原洧川县建制。按长葛、洧川两县的原界划开，划开后长葛辖7个区，1个镇，125个公社，1982个生产队，62475户，304833人，耕地面积555673亩；洧川县6个区，94个生产大队，1419个生产队，42923户，202540人，耕地面积492186亩。7月中旬，省、地批准长葛县委的第一区划方案，将洧川、朱曲、岗李、大马4个区及古桥区双洧河以北的村庄划归开封专区尉氏县等辖，8月31日移交工作结束。

1963年9月5日

长葛县“大四清”运动开始。运动中省委书记刘建勋在长葛县增福庙公社增福庙大队蹲点，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在长葛县增福庙公社杨寨大队蹲点。“四清”运动，虽然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6年8月，长葛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即行停止。

1966年5月25日

中共长葛县委按照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和许昌地委指示，发

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学习，利用黑板报、墙报、广播等宣传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县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立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4日

中共长葛县委“四清分团”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报》刊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精神，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工作队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和中南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广东黄山洞的经验，安排部署了机关、学校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发动群众大揭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清理评审四类（地、富、反、坏）分子，抓紧对犯错误干部的查证定案工作，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长葛县拉开序幕，使长葛县陷入十年浩劫的动乱之中。

1966年8月上旬

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公布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中旬，长葛县各个学校学生立即响应，走上街头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掀起横扫“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高潮，全县城、乡焚烧古旧书籍，捣毁屋脊兽头，砸烂碣碑，剪掉妇女头发辫及妇女鞋上的绣花，没收地、富、反、坏分子家庭以及普通百姓家的金银财币和古董玉器。使全县文物古迹、社会财富遭到破坏。

1966年8月下旬

中共长葛县委根据中央、省、地委指示，向全县高中、初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引导学生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

长葛县开始横扫所谓“牛鬼蛇神”，把一些领导和教职员工称做“黑帮”进行揪斗，特别是在全县教师集训班（在县一中）上，红卫兵将所谓的“牛鬼蛇神”理成“十字头”，使其赤脚，头戴高帽，在县城大街上游斗。嗣后日甚，遍及全县机关、学校、厂矿、农村。

1966年10月

《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点燃了红卫兵大串连之火。在此影响下，长葛县中学生陆续组织红卫兵组织，开始到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串连活动；外地红卫兵也到长葛进行所谓学习、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根据上级指示，为做好红卫兵串连的接待工作，县委确定在县委招待所设立红卫兵接待站。

1967年1月25日

长葛县在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影响下，各种造反派组织加紧树旗夺权活动。是日上午，在县一中操场，以县委机关群众组织为主成立“长葛县无产阶级联合造反总部”时，一中学生造反派冲进会场，使会议中断。到晚上10点，“联合总部”以“华建”、“造反团”群众组织要夺县委、县人委的权为由，在县机关餐厅召开紧急会议，抢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从此，围绕夺权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1967年1月26日上午

长葛县“联合总部”在县烟站召开县直机和部分公社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联合起来组建“红造委”，掌管全县党政大权。从此，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靠边站，党、政机关瘫痪。

1967年7月下旬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对河南群众组织表态：“河南二七公社为造反派”，属“河南二七公社”的长葛县“造反团”为造反派。在这种形势下，在对待县委领导干部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其中一派经过串连，成立了长葛县造反团——“炮打李玉宪，解放一大片联络站”（简称：炮打站）。嗣后，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攻击，为显示自己的组织是革命造反派，随意揪斗县领导干部，使大批领导干部备受摧残。

1968年2月4日

长葛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召开（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宣布革委会由57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委会常委13人），冯勇秀为主任委员，张家柱、毛贵林（军代表）、王立松（军代表）、杨村民为副主任委员。从此，长葛的党、政、军、群系统的领导机构，被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1968年3月16日

长葛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三忠于”活动（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求人人带语录兜、语录本、语录牌、毛主席像章，村村队队、家家户户建请示台，挂毛主席像，搞“早请示”、“晚汇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引向歧途。

1968年5月

长葛县造反组织掀起抢枪风。县“造反派”抢了县人武部一部分枪支弹药后，许昌烟厂、平顶山煤炭学校学生、郑州“河南二七公社五四战团”等造反派，先后来长葛抢走人武部部分枪支弹药。在抢枪过程中郑州“五四战团”与长葛“造反团”发生冲突，“五四战团”被打死一人，伤三人。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1968年7月18日

县“造反团”与王庄“联委”（均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立的群众组织）因4月28日张贴大字报发生争端，后两个组织群众之间多次发生摩擦、争执、战斗。7月18日早，造反团在县文化宫召开声讨王庄联委大会，8点大会结束后，又组织全体与会人员（约300余人）到王庄游行示威，见人就打，甚至有人开枪射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混乱中“联委”组织有人扔出一颗手榴弹，致“造反团”1人当场被炸死，13人被炸伤。当天下午造反团组织数百人把王庄村围得水泄不通，停水停电，王庄村群众不敢出门，围困长达5天5夜，造成多人受伤。后在县人民武装部的干预和调解下，23日下午造反团撤离王庄。这起事件（当时全县称王庄“7.18”事件）给王庄乃至周边的工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

1968年7月

长葛县革命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严禁打、砸、抢和破坏交通及生产的活动，限令群众组织交回枪支弹药。之后，县人民武装部被抢走的枪支弹药陆续被交回，从此全县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制止。

1968年8月

长葛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上级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精神，举办不同类型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集中600多名干部、职工开展大批判，深揭所谓阶级敌人，从此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即清理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及其坏分子）在全县展开。

1968年10月

中共中央批转了侯（庆林）、王（振余）《关于把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公社、大队来办和公办教师回原籍的建议》。长葛县革委会根据此建议决定

将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公社、大队去办，公办教师全部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举使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1970年2月11日

长葛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1970〕3号、5号、6号文件和河南省革委会召开的两次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县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21日至22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一次全委会，进一步研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会后全县组织15988人的骨干队伍，深入县直各单位、公社、大队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一打三反”运动就此在全县展开。运动中虽打击了少数坏分子，但形成乱揪乱斗局面，伤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

1976年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党集团。消息传来，全县人民群情振奋，衷心拥护，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1978年4月

中共长葛县委按照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成立长葛县委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右派分子的摘帽、改正工作。反右派运动中，长葛县被错划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855人，因右派问题失去公职的341人，共计1196人（其中135人交尉氏县摘改），此项工作于1981年年底基本结束。只摘帽、不予改正的2人，失去公职的341人，共1061人，其中除死亡的130人发给抚恤金和犯有新罪行的24人没有安排工作外，其余全部恢复公职，安排工作，并对受右派株连失去城镇户口的78户201人恢复了城镇户、粮关系。

1978年12月23日至31日

中共长葛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 218 人。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南工作的指示重点》；学习了省委段君毅、胡立教、刘杰等领导的讲话；认真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文香兰传达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针对长葛实际，揭发批判了原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的严重错误，并部署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整顿领导班子等工作，要求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梅炳喜

整风反右没完没了地反右倾，抓潘、杨，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本来是“左”的东西也当成了右，越批越“左”，人们的头脑发热了，膨胀了。真话，实话成为右倾；假话，大话成为革命。在那时，确实是瞪着两眼说瞎话。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各大报纸头版刊登着一条醒目的大标题，西平县一块麦田，麦穗上面坐着一个小孩，“亩产七千二百斤”！真的亩产7200斤吗？人们心里有底，但谁也不愿意说出口，到处是一片欢呼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变着法放“卫星”，发喜报。有的把地挖三尺深，里面埋上死狗死猫不说，还要死畜生熬成汤，浇到地里；有的每亩地种麦子几百斤，干什么？要放“卫星”向党报喜。在那时“奇迹”也分外的多。

转眼之间，大墙周出现了一个“双万头”猪场，现场会接二连三，参观者络绎不绝；玉米取得大丰收，亩产超过了“双吨”，人们抬着大玉米棒游行，似乎想让人们相信：这不欺不骗，千真万确；土法炼钢铁传出捷报，西山炼铁炉流出铁水“双百吨”；食堂里生活大改善，人们抬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盘点心，意思是说，社员们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顿顿吃点心是家常便饭。

今日回想起来那时的景况，确实使人浑身发怵。

1960年毛主席向全国各级干部，包括农村生产队在内发表了一封信，意思是要反浮夸，要算账。在夏秋之间的一天，县委通知在县城召开收听广播大会，三中校长魏光轩和我骑车子赶到了县城。当时会场设在县一中餐厅，主要是收听省委书记吴芝圃讲话。他检讨自己的浮夸风，意思是说在河南出现的严重问题由他负责，不要层层揪，层层斗，为广大基层干部解脱了罪过。会议结束，魏校长我们两个就骑车往学校赶。在那些日子，连降大雨，田地里，大小路上一片汪洋，我们从和尚桥出发已是上灯时分。在又窄又高底不平又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昏天黑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推着自行车，到老城时已是十一点多了。我俩浑身是汗又饥又累，到我家想找点东西充

饥，当时在食堂里是一无所有，每顿社员只有喝青菜汤。我母亲在食堂里做饭，他看到我们两个的狼狈象，就赶快东找西寻给我们弄吃的，最后只拿出了3个冰凉的红薯渣掺野菜蒸的窝窝头。窝窝头就白开水每人吃了一个。在哪个年月吃这样的“招待餐”，无须解释，无须道歉，我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瞧瞧你，无言以对。我俩告辞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辘辘的肚肠朝洧川赶去。

在大跃进一片欢呼声中，学校也要紧跟形势，走出校门，奔向社会。1959年初冬，公社领导指示，学生放假，参加挖坑塘，修水库。贾木聚同志我们几人领着一个年级6个班学生，赶到了洧川西许岩水库。天空飘着雪花，赶到工地放下行李，跳进水库里就干了起来。工地上到处是红旗，锣鼓喧天，大家干着吆喝着，有人穿着裤衩，有人光着脊梁，可谓热火朝天，如果有谁稍一怠慢，马上大祸临头，轻者是现场务虚。所谓务虚就是有“错”者站在中间，周围群众，你一言，我一语，你一推，我一拉，你一拳，我一脚，把你“务”得帽戴歪邪，发誓赌咒，永不再敢，才可解放。我领着学生也不能怠慢。我二十多岁，不甘落后，原来两人抬一筐土，干脆我自己扛吧，长方形的土筐，大家往我肩上一撂，扛住就走，一干就是半晌，要说那时想的啥，很简单，就是干。

在教学领域里不讲教育规律，不讲循序渐进，科学态度被视为右倾。1959年我担任初中一年级语文课。这时正赶上县里举行的观摩教学。县一、二、三中每处学校推荐1人举行公开课，全县中学语文教师集中听课。三中领导决定由我主讲。我心里忐忑不安，讲砸了个人挨批是小事，影响长葛三中声誉可了不得。当然决定的事是改变不了得，差没二派嘛！三中语文组集体帮我备课。我选择了《社戏》这一课。主要内容是讲鲁迅先生幼年的故事。为讲好鲁迅的作品，我参阅了不少资料。吸收大家的意见按教学计划分为4个课时讲，也就是说要加强“双基”教学，运用常规教学的5个环节来完成任务。经过大家讨论，教案写出来了，通过在同头班试讲，效果还可以，单等上“阵”了。这时县里通知下来了，从三中开始，全县中学语文教师集中到了三中。原来想着按顺序，听了一二中讲课后，有什么问题再变计划也不晚。“前头有车，后头有辙”，反正“跟着下，不害怕”。谁知，这一下不行了，只有硬着头皮讲。我按部就班讲了4节。县里主持按一、二、三中编成了三个评议组。大会上县领导讲了话，我一听势头不对，不是评课而是反右倾。一课书讲了4节，标准右倾，后悔也来不及了。一二中两个组，这个批了那个批，像是轰炸机轮番投弹，把这个观摩课说得一无是处，

真可谓批得体无完肤。开始我还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听来听去，听出了点门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县里个别人是想借评课批判学校。在总结会上公开提出要批长葛三中的右倾，甚至提出要砍长葛三中这面红旗。阵势摆开了，我们当仁不让，学校领导提出要找县委书记，一时闹得不可开交，评议会不了了之。

我随着一帮听课队伍来到了县城一中。一中语文老师讲的是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他接受我这次深刻教训，采用跃进式讲法，上课让学生自学课文，然后分组讨论，最后15分钟个人写小字报。一课书一节时间利利亮亮。在评议会上一位老师不无讽刺的感叹道：听君一节课，胜读十年书！那时的二中在和尚桥，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实行的是“三讲八环，加深加广”，由于参谋多，顾问多，教师昼夜得不到休息，晚上备课到凌晨，第二天仍要照常上课。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由于姐姐他们经常下乡出差在外，就将其长女梅丽送回长葛老家请母亲暂时照料一段时间。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从城市到农村生活落差太大，况且那时物资极端匮乏，一切都凭票供应，母亲每天最为发愁的事就是让小梅丽吃什么。这段经历对这个丫头来说，时间虽短，却刻骨铭心。回贵阳后，只要一提及去姥姥家，她就哭，太害怕了。这件事成了大家的趣谈。

（作者梅炳喜：曾任长葛县多处学校校长及市教委工会主席）

“生动”的一课

梅炳喜

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打出了一张王牌，请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这个政治舞台。全国一片欢呼，万岁，万岁，不绝于耳。

长葛三中（即后来的尉氏三中）进驻了一支有县林场工人和拖拉机手组成的工宣队。这支不足5人的工宣队雄赳赳地走进了学校。为了震慑知识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要求行动军事化，不管干什么都得排队，吃饭时教师们拿住碗筷列队进饭厅，然后跟着他们高声唱祝愿歌。工宣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丰富的阶级感情，他们虽然拿不准调，但他们可着嗓门喊，以表忠心。教师们垂头丧气，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唯唯诺诺，好像念藏经。因此，每顿饭前将“毛主席呀毛主席端起饭碗想起你”这几句歌词唱得如哭如泣，使人听起来哭笑不得。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这些“臭老九”，生来就带有反骨，你不整就不行。况且他们这次是带着尚方宝剑的，谁敢大声哼一声，马上给个脸色看看。

一天，学校当局奉命通知：午饭后一点半在会议室召开全体教师会。最后加了一句话：自带凳子。午饭后我不敢怠慢，夹住个小凳子提前坐在会议室角落不显眼的地方。会场上无人说话，无人左顾右盼，大家静静地心情不安地等待受训斥。那个原拖拉机手，现工宣队长手提一块小黑板走了进来。有人用猜疑的眼光偷偷地盯着他，不知今天他要使出什么新花招。这位队长不知怎么啦，从进校的第一天起就拉长着脸，从来没有见他笑过。老是把两只不太大的眼瞪得想要裂开似的。没有好声好气地说过话，好像是这些臭知识分子在找他茬子，在和他作对，在和他过意不去。开会了，这位队长坐在正位置上开腔了：今天我这个大老粗要给你们这些大老细们讲一课。他这一句开宗明义，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想，今天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场面，你讲我听。只见这位工宣队长在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大大的“工”字，接着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字？”老师们颤颤惊惊，没有人敢回答。他以高八度的声音自我回答：“这是个‘工’字！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的一横是地——我工人阶级顶天立地！我工人阶级就是要领导一切！这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你们还不服

吗？”他环视着大家，我的天！老师们谁敢不服？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这位工宣队长，稍微停歇了一下，又说，我下面讲的是啥呀！就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时，他又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非常吃力地、歪歪扭扭地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写完后他突然扭过身来大声问道：这几个字我写的好不好？他的脸色较平日更加难看，既黑又红，像是要和别人干仗。说实在话，他写这五个字比小学三年级学生写得稍强一点，标准的“童”体字。在场的臭老九们搭拉着脑袋无人应声，会场静得掉地上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有谁去碰这个钉子呢？反正是“啥贵不吃啥”就得了。这位队长听听没反响，看看没表情，接着又讲开了。他说，大家都知道张思德是在烧炭时炭窑崩塌而死，我找一个人说说，炭窑是咋崩塌的？这个问题要说也好答，当时被叫起的老师，精神太紧张，一阵结结巴巴说不明白。队长可抓住了把柄，大加训斥，连讽刺带挖苦，将这位老师羞得无地自容。这位队长乘胜追击，接着又说，谁知道什么木烧炭最好？我当时想：咱们这里枣木炭最好。但是不到点住我的名是怎么也不会说的。英雄所见略同。会场上鸦雀无声。这时队长非常自豪地说，我看您都说不上来吧！青冈木烧出的木炭最好？他说着那神情自得的样子，好像是他第一个发现了新大陆。他认为开头这两个问题，像两只拳头把臭老九打得蜷缩在角落里不敢妄动，不如再一顿痛打，省得这群臭知识分子有余息尚存。这个队长在嗯嗯啊啊地讲了一通妇孺皆知的大道理后，索性撇开书本“旁征博引”起来。他说。都说臭知识分子懂得多，不服气，下面我提几个问题再给你们较量较量，他指名道姓地问一位年纪较大的生物教师，你说说，红薯有几根须根？这位教师不仅在学校有声望，就在当时全县三处中学教师中也是首曲一指。长葛三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全国出名，与他们生物组全体教师的努力分不开。他们平日在教学中理论和实践结合，指导学生边生产边劳动，对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的习性了如指掌。队长先生提这个问题是在故意找杈子：红薯秧子落地生根，一棵薯蔓上到处是根，这些毛根到底有多少根，谁能数得清？他提这个问题你答也得挨批，你不答也得挨批，给他们较什么劲？这位老师干脆避而不答。队长先生气上来了，他大声吼道：我量你也答不上来。接着是吆喝他，只会识那几个字，只会那几句臭理论，只会白吃劳动人民的血汗。接着他又点起了另一位生物教师，问他：你说说谷子几个叶出穗？谷子七个叶抽穗谁都知道，但这位老师站起来只是笑了笑。队长指着他说，连这个普通的问题你也答不上来！你算什么生物教师！他劈头盖脸地说臭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臭老师只会洗手弹指甲、游手好闲，说臭老师

只会讲穿讲戴讲干净。他这一连几个“臭”字，把知识分子说得不如一泡“臭狗屎”。在那些日子里“五讲四美”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得窝窝囊囊算是俭朴，算是深入联系工农，算是思想上接受了改造。工宣队及学校造反派带领教师下村里助收，晚上住在村办公室，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有几个教师在刷牙，头头看见了，大批特批。问，贫下中农早上刷牙吗？这是没有把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放下来，这是脱离贫下中农，几顶“帽子”戴到头上，把教师“镇”得连衣服也不敢洗了。这次讲课，队长先生旧话重提，目的就是在给“老九”们加深加深印象。

工人阶级“老大哥”这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尽管队长说得口干舌燥，该咒的咒了，该骂的骂了，但他仍然是指手划脚地讲个不休。他光骂“老九”显得太单调，接着就自吹自擂起来，他说，您谁吃过毛主席种的菜，这时，他无比光荣和自豪的感觉一下涌往面部，脸由长变圆。至于他吃没吃过，也无人去考究，也无人敢去考究，也大为不必去考究，值得吗？队长东一榔头西一斧，慢慢兴致大减，在他看来这一仗已大获全胜。临结束，他环视全场大声地问：“谁敢与我较量的站出来！”

26个年头过去了，如果这位“队长”还健在的话，估计他的年龄已离70岁不远了。当他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年的“精彩”表演的话，恐怕是感触颇深吧！

（作者简介见前文）

中组部五七干校在长葛

李朝举

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 1969 年 12 月由吉林省通榆县迁入长葛，1976 年干校又搬到河北省固安县，在长葛历时达六年之久。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负责与干校的日常工作联系。

干校在长葛，校部住老城原县政府大院，开始实行军管，由军管组（也叫业务组）领导。部队的主要负责人有：牛树声、段青泉，杨义文等。1970 年 9 月杨义文同志还被选为长葛县第四届县委委员。1973 年部队干部撤走，由中组部在干校的主要负责人杨发陶同志主持干校全面工作直至搬走（杨 1976 年回中组部任办公厅主任）。

干校全部学员，包括中纪委的同志，约计 500 人以上，年龄大的占多数，年轻同志较少。他们分五个连，分别在校部、县农科所、原种场和老城，大墙周插队的两个连，以在原种场的三连人数最多。来干校的部级领导，我所知道的有：郑位三、李力安，李步新，曾涤、杨易辰等。曾涤同志经办接收了原种场，杨易辰有一手好木工手艺，在校部负责做木活，内部叫他老杨，外人叫他杨木匠。他们从通榆县带来不少木材，除自用维修门窗，做家具，建房子外，还支援了县、社有关单位。李力安、李步新在原种场参加劳动，都能正确对待当时的情况，自觉地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后学员陆续回京分配工作，在老城，大墙周的学员也都全部集中在干校劳动基地一原种场参加劳动、搞科学试验。

在工作联系中，听校部的领导同志讲：干校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员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认识，其次是帮助地方作点有益的工作。比如在老城、大墙周插队的同志，除了组织他们学习，接受广大群众的再教育外，还帮助所在大队搞农副业生产，搞整党等，群众反映很好。说什么：听说干校来的都是大干部，实际穿的衣服很一般，干起活来很卖劲，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一点大干部架子。当时拖拉机很不好买，凡干校学员住过的大队，在学员的帮助下，都买了一台，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住校部的卫生室，帮大队培训赤脚医生，义务给群众针灸、看病，帮助联系有关设备等。

干校在长葛，和县上的关系搞得相当好，对长葛的各项工作帮助很大，

县委、县政府，包括县直各个机关对干校在长葛都感高兴。干校领导，不论是军管时期或杨发陶同志主持工作时，谈论起来也都很满意。一是长葛干群素质高，各项工作先进，有利于五七战士的学习提高；二是长葛地处中原，交通方便，中组部领导和干校学员以及学员家属来往方便，三是长葛给提供了好的校址和有利的劳动场所，有利于培养农、林、牧，副业生产的科技人材，四是长葛县委，县政府对干校的大力支持。书记、县长逢年过节带人到干校慰问探望。每年三夏大忙时，组织县直干部到原种场帮助收麦，种秋。

总之，中组部五七干校在长葛的一切工作是顺利的，对长葛的各项工作确实帮助很大，直至现在还关心长葛，了解长葛，为长葛当前的大好形势感到高兴。

刘建勋同志在增福庙村的日子

王法 口述/刘惠玲 整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刘建勋同志带领王靖文、董子俊等一行二十多人，来到增福庙村蹲点。

按农历当时正是七月初三，正是农作物需水量最多的季节。然而，干旱了四十多天，田野龟裂，禾苗枯萎，人们盼雨望眼欲穿，因为全村无一眼机井可用于浇灌，我身为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只能与群众一样心急如焚而束手无策。刘建勋同志目睹这样的现实情况，立即主持召开干群会议做了紧急动员，他建议，为了保粮，只有全民动员，盆盆罐罐上阵，浇一棵保一棵。在群众行动起来之后，刘建勋同志立即返回省城，说明情况取得省水利部门的配合，很快水利厅长及有关水利技术人员一行二十多人冒着酷暑带上钻机测量仪器等设备来到增福庙村安营扎寨搞突击，刘建勋同志始终与技术人员一样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坚守在水利工地，随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经过三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共同苦战，终于成功地钻出深井5眼，并千方百计搞了配套。只因缺少一个12寸水泵无法解决，当时本省没有，刘建勋同志就与有关负责人商议，本省搞不到就到省外解决。最后终于从上海调来一台，一眼眼机井出水了，一周内700余亩地普浇了一遍，人们一改靠天吃饭的习惯，也从内心里无限感激刘政委的苦心扶持，把刘建勋同志视为当之无愧的救命恩人，一位老大娘握住刘建勋的手说：“刘政委，是您救了庄稼，也救了俺们的命！”

小许村与增福庙村之间只一路之隔，同属一个辖区，由于铁路路基挡住了水流去路，一遇大雨，田间积水没腰，有200亩农作物被淹，长期得不到解决。六五年七月的一天，我和寇秀芝一起去观察水情，见积水足有一米深，我们及时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刘建勋同志，他立即与铁路部门协商，由铁路主管部门派技工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奋战，建成了排水涵洞，从此，大水有了出路，该村土地再未被淹过。

刘建勋同志工作作风朴实，时时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实事求是，一杆子插到底地深入基层，解决问题果断而快速，从不敷衍了事，不摆官架子，他自己制订了戒律，一不住干部家，二不住经济条件好的群众家，毅然与光

棍汉石宝金同住一室、见石宝金一个人烙馍，就为他烧火，一起烙馍。对其他的贫困户也经常亲自去家问寒嘘暖。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一天上午，刘建勋同志坐车来到村里，我赶快迎上去把他让进屋里，屋里没有凳子，刘书记席地而坐，问我“家里肥料备齐了吗？地整得怎样？”我说：“准备好了”他又问“石宝金生活得怎样？吕玉兰（贫困户）生活得怎么样？”并开车去贫困户家访贫问苦，到吕玉兰家后问“大娘，吃过饭了吗？”吕玉兰激动地说：“刘政委，我家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刘建勋说：“没事，咱们就坐在地上说话吧！”刘建勋同志就是这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刘建勋离开了增福庙村，可俺村的老少爷们至今一直想念着他。

一九四三年“年馑”纪实

袁耀坤

1942年麦收以后，多少下了一些雨，农民勉强把晚秋种上。后来虽然也下过几场雨，但总是雨过地皮干，远远不能满足大秋和晚秋庄稼生长的需要。所有的农作物长期面临干渴的窘境。每到中午前后，烈日当空，熏风如火，地灼炙人，庄稼苗恰似滚水泼过一样，叶子全部耷拉着，有的甚至枯黄而死，让人看着焦急而又难心！

那时的当局，只顾搜刮，那管百姓死活，更不领导群众去抗旱自救。也有一些多壮丁的农户，挖个土井，浇上一片萝卜、白菜之类的代食品，而绝大部分群众都是靠天下雨，无可奈何地观望等待着。

农民久等不雨，绝望中只有烧香求神。经常见有成群老妪头顶簸箕，跪在十字路口烧香叩头，求天下雨。也有一村或几村的群众纠集到一起，手执各种器械，抬着关公、孙猴子（猴爷）的塑像，敲锣打鼓，烧香磕头，前呼后拥，铙炮齐鸣，到某个大庙里去求雨。我们村就曾到县城西关（今老城）天爷庙里拜天祈雨。求雨群众经过一天折腾之后，除了疲劳困乏之外，不要说求不到雨，甚至连块遮日的阴云也是无法求到的。

早秋（高粱、早谷）抽穗时，由于天旱缺墒，正是人们所说的“搦脖子”，穗出半截就憋住出不来了。晚谷也出了个毛毛穗，连一个谷籽也没有结，只收了一把秕谷糠。豆子全部干死，颗粒无收。红薯秧干干巴巴地长不满地，连块红薯也长不成，棵棵都是“老鸱爪”，只有弯弯曲曲的几条红薯根。就这些东西，最后都成了群众果腹的主要食粮。

秋粮绝收以后，降了一场大雨，人们算把麦子种到地里，进入冬季，人们还有把谷糠和红薯叶，勉强可以糊口度日。这时，有些人家趁着体力还好，准备外出逃荒，有的变卖家产购粮备荒，有些毫无度荒打算的人家，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紧急关头，缺粮断炊，以至部分亲人和全家老小生命不保。这种血的教训，当为灾后幸存者的借鉴！

1943年的春节，人们是在极其惨淡的情况下度过的。除夕之夜，村村沉寂，户户寡欢，听不到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大年初一，吃饺子、吃肉的村民，实在是寥寥无几。穿新衣戴花帽的儿童更是少见。村民们相聚无言，沉

闷多愁，听不到往昔年节相互道贺的欢声笑语。

春节过后，天气渐暖，村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一天比一天严峻，多数人面有饥色，行动缓慢。特别是年老体弱的人，骨瘦如柴，走路艰难，他们在昏黄的阳光下，依门而卧，处于半死不活的昏迷状态之中。

榆钱、柳叶刚刚发青，就被饥民捋光了。接着凡是能以下咽的如椿叶、杨叶等等，都被捋了充作食物。树叶吃光了，就吃榆树皮。每到一个村庄，都会看到榆皮被剥得一人多高。村上静悄悄的，很少见人活动，连鸡鸣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真象走入毫无生机的死一般的世界。

逢集逢会，变卖衣物、家具的居多，买主却很少见，所以价钱十分便宜。平时很值钱的东西，那时只要能换一两个蒸馍就不错了。能吃的东西倒很昂贵，小麦每市斗（14市斤）350元，蒸馍5元钱一个。其他如红薯叶、荞麦叶、花生皮、高粱壳、秕谷糠也都成了值钱的东西。时值青黄不接的阳春三月，集市中秩序混乱，成群结队的饥民，来回游动着乘机抓馍吃。正在吃饭的人一不小心，手里的馍就会被抓走。他们甚至把卖馍的摊子掀翻抢着吃。尽管挨打挨骂，脸上流着血，手上擦破皮，还是把抢到手的馍连三赶四地往嘴里塞。有的还怕抓到手的馍被原主夺走，就往馍上吐唾沫把馍弄脏。这样，他们就平安无事地吞食起来。中国有句古话：“衣食足知荣辱”，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填饱肚子，其他一切都置之不顾了。

更不忍心看到的是城内（今老城）城隍庙前的惨象，庙前有条长约近百米用砖石铺成的甬路。每天早上，甬路两旁摆满半死不活的两三岁大小的男女儿童。他（她）们瘦得皮包骨头，只显一个大大的脑袋。他（她）们的躯体已经没有支撑脑袋的气力，伏身偏首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他（她）们的父母远远地站在一边，翘首盼望自己的孩子被有钱的人家拾走，让孩子逃个活命。一旦有人捡走某个孩子，孩子的父母怀着三分难舍，七分慰藉的心情洒泪而去。如果孩子没人捡走，当父母的谁也不忍心扔下自己的骨肉于不顾，最后只得少气无力地把个垂头闭目的连心肉带回家去。

当时的政府，在一些关心灾民疾苦的正义人士的呼吁下，也在救灾方面采取一些有形而乏力的措施：一是平糶，用公款到周口一带购买粗粮，返回后，以平价向灾民出售，灾民钱从何来？只有望粮兴叹，别无他法。二是开仓放赈，把县仓里积存的谷子，分发到各保，由保里负责设立粥场，每日供给部分最穷困的灾民一碗糠糊涂。可是没停多久，谷尽粥停，即将饿死的灾民连碗稀糊涂也喝不上，只该坐以待毙了。三是在老城泰山庙设立救济院，收养一些儿童，在院食宿。虽然采取以上措施，但由于灾情严重，灾民众

多，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加上管理制度不严，经手人从中克扣，中饱私囊，灾民受益，百不获一，因饥饿而死的大有人在。几乎每日每村都有人空腹咽气，葬入荒丘。就以救济院来说，天天都有几个饿死的小孩儿，被人用麻包装着扔进庙后的土沟里。

在那哀鸿遍野，惨象环生的情景下，反动当局仍不放弃对广大群众的压榨和盘剥。他们通过层层机构向饥民逼粮逼款。爪牙四出，棍索交加，逼得群众走投无路。有些毫无人性的保长和保丁，竟把人家倒在磨上的粮食都抢走，广大饥民哪里还有一线的生路呢？

当时的学校，虽然没有关门停课，但终日到校坚持学习的却是稀稀啦啦，人少座空。我当时正在禹县顺店省立汲县师范读书，每班学生人数经常能保持三分之一（10几个人）就不错了。临到期末，学生返校应付一下期末考试就算完事。其他省立学校情况基本和我们学校没有多大差别。在那饿殍载道的年馑上，学校也无法对学生严格要求，只该得过且过了。省立学校尚且如此，至于县里和县以下的乡村学校更是冷冷清清，经常到校学习的，就少得可怜了。

一般情况下，土地的价格是很贵的，劳动农民集攒多年也买不上一亩地。但在大饥之年，土地也变为贱价之物。一亩土地仅能换上一市斗（14市斤）小麦。一般农户就有三五亩地，指望卖地度荒实在维持不了多少时光，地卖完人死净的人家不在少数。也有的劳动人家，深知土地之可贵，硬守着几亩地却遭到灭门之祸。也有个别农户，看到土地价格便宜，拿自己家里的口粮去换几亩土地，但到最后却吃了大亏，不仅忍饥挨饿，而且把身家性命都丢掉了。当时最得意的是那些为富不仁，见死不救的有钱有粮的人家。正当灾民借贷无门，即将饿死的紧急关口，那些利欲熏心，趁火打劫的殷实富户，用一斗小麦换回农民的一亩好地。转眼间，他们就成了上百亩或几百亩地的大财主。而在他们周围，却出现了好多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民。

大灾过后，广大灾民有的灭门绝户，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各奔东西；有的背井离乡，下落不明；即使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也是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们这些惨绝人寰的不幸遭遇，目睹者不禁为之寒心落泪，耳闻者也会因之悚然而变色呀！

（作者袁耀坤：见《长葛县地名综述》注）

长葛县农业合作化运动

张继先 整理

1950年的土地改革，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但由于土地仍属私有制，刚刚翻身的贫下中农，因生产工具不足，资金短缺，一遇自然灾害，则无力抵御。为了帮助农民彻底翻身，发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逐步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互助组，发展为初级社、高级社、管理区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互助组

据中共长葛县委文件（〔1951〕永久17号）记载，长葛县历史上第一个互助组是坡胡乡坡胡村共产党员胡学章为组长的互助组，据胡学章口述，他们的互助组，是从1948年开始，由其本人和薛木林、薛奎元、薛同福4户，23口人，合伙从事买树木，解（锯）板、卖木料（货），先从副业生产进行合作互助的。1950年7月，土改以后，互助合作由副业发展到农业，参加户数由4户发展到6户（贫农4户，中农两户）。38口人，7个整劳力，9个半劳力，57.2亩地，两头牛，一头驴，一辆车，三辆手推车，一张耩，一张犁，一盘耙。筹建2个烟坑。当时县委领导很重视，区委书记孙洪章（现在洛阳一拖），亲自住组负责帮助。为了珍惜助长这一新生幼苗，人民政府贷小米3200斤和部分款项，给予扶持发展壮大。

1951年县委把组织劳动互助当作当年工作重点。在县委“统一领导，扩大宣传，重点组织，培养典型，取得经验，推广全面”的方针指导下，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进步。是年8月，全县83个乡中已有58个乡869户，4061口人自愿结合，组成了193个互助组，最多的是坡胡乡，有73户，420口人，组成了15个互助组。分别占其总户数，总人口的12%和10%。当年年底，全县的合作互助组发展到1700个，加入农户4975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21%，入组农民19265人、占农业总人口7.1%。

1952年，经过反右倾，明确了互助合作的方向，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5月中旬，全县互助组发展到2634个，入组农户12428户，入

组农民 60264 口人，分别占总农户，农业总人口的 22% 与 20.5%，消减了空白乡。是年秋季，互助组又发展到 4312 个，加入农户 17004 户，入组农民 77182 口人，分别占全县总农户与农业总人口的 36.3% 与 27.9%。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每亩平均 156 斤，比 1951 年每亩增产 36 斤；比单干户每亩多收 30 斤。农业互助合作优越性有了比较明确的体现。

1953 年，县委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大力发展与提高临时互助组，积极巩固提高常年互助组，重点试办农业合作社，经过巩固提高，全县共有互助组 3481 个，加入农户 14712 户，入组农民 71143 人，分别占总农产和农业总人口的 26% 与 24%。其中常年互助组有 2378 个，9853 户，占已组织起来农户的 69.5%；临时互助组 1103 个，4319 户，占已组织起来农户的 30.5%。

1954 年，是互助组发展到最多和水平最高的一年。全县共有 4963 个互助组，加入农户 45215 户，占总户 48.4%，入组农民 226075 口人，占农业总人口 45.5%。这批农业互助组持续发展到了 1955 年春季，先后随着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诞生与发展，农业互助组逐步演变成了初级农业合作社。总之，1950—1955 年的农业互助合作，是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新型的生产组织，它对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是在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地、劳各半或以劳为主的比例分红，保留社员土地所有权，但拥有相当部分的公有生产资料，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长葛县最早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石固镇宗庄乡共产党员郑修堂创建的“增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该社是 1953 年 3 月 10 日经中共长葛县委拟请中共许昌地委于 1953 年 3 月 20 日正式批准成立的（1953 中共长葛县委文件卷 17 文书处理 1 号）。其前身是一个基础条件较好的农副业结合的常年定型互助组，该组是 1950 年 10 月，由 5 户农民（贫四、中一）组织起来的。1951 年，因干旱发生矛盾，出组一户，1952 年春又加入 3 户，贫农，到 10 月已发展到 9 户。转社时共计 15 户，82 口人，36 个劳力（男 19，女 17），136 亩耕地，当时，作价入社或公共购置的公有制生产工具计有：牲口 5 头、水车（机）3 部、新式步犁 2 张、烟坑 2 个，切红薯机一部、磨红薯（粉坊）、豆腐家具两套、喷雾器一个、小件农具 34 件；当时仍属私有的财

产工具，计有：大车3辆、旧犁5张、耙2张，耒1张，全社农具齐全。生产管理，实行评工记分，由原来的不记分到记1分，由死记到活记，由活记到包工，不断改进。同年冬季，县委又试办了增福庙乡，增福庙村王水旺“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韩佐区榆林赵乡霍庄薛成山的农业互助组（1951年冬原洧川县第一个互助组）改选后由赵宝领导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底，又报请许昌地委批准，由组转为初级社的计有6个，分别是：五区宗庄乡宗庄村楚同秀领导的“人民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区双庙乡双庙村孙小狗领导的“共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七区王买乡孟排村马同义领导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区大谷寺乡大谷寺村吕货领导的“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六区增福庙乡增福庙村王振法领导的“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区赵庄乡大路张村张法田领导的“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据当时统计资料，入社之后，夏季收成每亩平均单产139斤，秋季257斤，比入社之前单干户一般增产2—3成。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了生产运动，使农民进一步体验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此时，全县已有20个初级农业合作社，社名和社长分别是：

共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共同社，下同），社长孙小狗；五星社，社长李生；和平社，社长孙书德；前进社，社长吕货；进步社，社长张占江；前锋社，社长冀六成；五四社，社长张法田；建华社，社长黄同聚；建国社，社长杨清堂；人民社，社长郑修堂；增产社，社长楚同秀；东方社，社长王国福；胡新社，社长胡学章，先进社，社长王水旺；三星社，社长高大昌；五星社，社长王振法；佛新社，社长高兰英；胜利社，社长马同义；联盟社，社长赵金奎；爱国社，社长范水成。

以上20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共计332户，1643人。

中央文件发布后，加快了初级社的发展步伐，夏季发展到52个，1052户，5004人，秋季发展到145个，5238户，28150人，冬季达到573个，1760户，86015人，占总农户的18.8%，占农业总人口的18.03%，此时初级社已遍及各乡。

1955年5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的发表，同年9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又一次促进了初级社的发展。当年年底，全县初级社发展到2183个，入社农户达83159户，410200人，占总农户的84.5%，占农业总人口83.4%。从而，全县农村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各户的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实行按劳分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我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55年冬，县委在增福庙乡增福庙村，以王水旺领导的初级社为试点，建立起来的。1955年，有些地方仿照苏联做法叫农庄，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毛泽东同志每篇都加有按语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发行，促进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2月，全县就建成高级社113个，5月又建成16个，共计129个，入社农户9932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9.8%，有些参加高级社的是一哄而起，思想基础差，迫于形势而转入高级社。全县单干户仅剩下26户，占0.2%，这时的高级社，社均705户，3498门人。其规模之大，发展之快，前所未有。从此，全县已经胜利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一刀切”的做法，还有一些地方连互助组也没有搞就跑步进入了高级社。

管理区与公社

1956年冬到1957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调整了社、队规模。本着一村（100—300户的村）一社或两村一社的原则（过小的村也有三村、四村一社的），进行分区规划，实行分区管理（即管理区）。全县共划为514个自负盈亏的管理区，每区平均近900口人。这时的管理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劳动组合和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仅搞了一次分配，即告结束，恢复为高级社。1957年底，全县调整为525个高级社（分社），3325个生产队。社均200户，社下分生产队，队均30户，把原来的社、区、队三级所有变为社、队两级所有。

高级社时期是我县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小型水库、渠道、塘、堰、坝等水利工程和机械，灌溉设备都是从无到有，高速度发展。据统计资料，1955—1957年，全县农田兴修小型水渠362条，小型水库5座，塘、堰、坝183个，新增水车8319部，新打水井28280眼，加上老井，计有水井42303眼，是建国初5274眼的8.02倍，有60部420马力的灌溉机械，是1953年的3倍，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1957年全

县 525 个高级社，粮食亩产达到 153 公斤，比 1949 年的 85 公斤。增长 80%，年均递增速度为 7.62%，属于历史上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人民公社

1958 年 8 月 23、24、25 日三天，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精神，把高级农业合作社，仿照新乡七里营的做法建立人民公社，长葛县不论条件，三两天内纷纷成立人民公社，而且宣布，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相应取消了乡的建制，成为政社合一体制，当时，长葛县共 20 个乡，525 个高级社，103032 户，500456 口人，转并为 18 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 5724 户，27803 口人。其中，最大的是坡胡人民公社，它包括原来的石固、坡胡、后河三个乡，共 17234 户，85313 口人，拥有 156294 亩耕地。其余 17 个社，是以原来的乡为基础，均为一乡一社。18 个人民公社下设 92 个管理区和 1899 个生产队。实行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领导的管理体制。

1959 年 3 月，对人民公社的规模又进行扩大，将原来的官亭、双庙、石象、双庙李、韩佐、大马七个人民公社撤销，并转为 11 个人民公社，即：坡胡、和尚桥、增福庙、城关（即现在的老城）、大墙周、董村、洧川、朱曲、段庄、古桥、南席人民公社。同时取消管理区，建立了 411 个生产大队和 1926 个生产队。4 月，中央确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由于路线“左倾”，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开始，就不断出现“五风”错误，特别是 1958—1960 年，形成了普遍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以及高指标、高征购、吃饭不要钱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瞎指挥风盛行，提出许多唯心主义的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脚踏地球手扒天，敢叫产量翻几番”等等，致使农村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出现历史性的倒退。农业生产呈现了建国以后的历史最低水平。据统计 1961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降至 5508 万公斤，总产额降到 1475 万元（57 年不变价），分别比 1950 年减少 23.6% 和 32.3%；分别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减少 42% 和 64.1%。加上天灾（旱灾），从而导致出现了令人难忘的 1959 年—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

1959 年春，县委组织力量对因“五风”错误造成的经济混乱进行了清算，对于国家欠公社、公社欠国家、公社欠大队、大队欠公社、大队欠社员、社员欠大队等多方面纵横相关错综复杂的“一平二调”经济手续，逐

笔造册登记，据实清算处理，认真组织退赔兑现。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清退一平二调大算帐”。通过清算，稳定了干群情绪，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认真抓了生产救灾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共发救灾款 260 多万元，粮 365 万公斤，布 60 万尺，棉 25 万公斤，煤 30 万吨，衣被 24000 多件，副食 5 万多公斤。减免农业税 134 万元，工商税 150 万元，从而，在“保人、保畜、保生产”的口号下渡过了难关。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了全面调整国民经济。7 月，又实行政社分设，全县划分为 10 个政区，42 个中型人民公社，682 个大队，3351 个生产队。

1962 年 1 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正式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年，本县政区数目增加，公社规模再次划小，生产大队被撤销。全县共划为 14 个区（镇），下辖 202 个公社，3359 个生产队。这时的人民公社，后来被人们称为小型公社，公社规模平均 400 多户，2000 多口人，这一管理体制沿行至 1965 年。1965 年 8 月，洧川、朱曲、大马、岗李四个区划归尉氏。1966 年“四清”结束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又发生一次重大调整。撤销区建制，扩大人民公社规模，恢复生产大队一级管理体制。长葛县划为和尚桥、后河、石固、坡胡、增福庙、官亭、老城、董村、石象、古桥、南席、大墙周等 12 个人民公社，249 个大队，2195 个生产队。这体制一直沿行到 1983 年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级人民政府为止。其间只是随着人口发展变化，增划了一部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人民公社规模再无变化，在这一较长时期内，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平均主义，保障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但由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和人为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农业生产一直受到束缚。特别是“十年文革”时期，“五风”错误，又有重演，致使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农村经济困境长期未能摆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农业生产，方才得到长足的发展。

（说明：本文数字来源于档案资料、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

（整理者张继先：长葛县农业局干部，曾任县政协副主席）

长葛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

张守义

我受政协委托，为采写长葛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坡胡乡坡胡村胡学章互助组的史料，1999年7月份先后与当年坡胡乡副乡长苏坤（现年77岁）、胡学章互助组干部胡学俭（现年80岁）、农户成员薛木林（现年72岁）诸位老先生进行了多次座谈回忆，现整理如下，因时隔近半个世纪，文中遗漏难免，敬请知情者补充。

1950年，胡学章这位逃荒要饭的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从内心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下决心要种好田，多打粮食。他善于动脑筋总结种田增产增收的经验。有一户种的新品种“白马牙”玉米，一棵结了四个棒子，他发现后就在自己地里试种并取得高产。还有一户在原是粪坑的地方种的红薯，一棵产量达29斤。他发现这种情况后，就提出穴栽法，即先挖穴，在穴里施肥，然后栽上红薯，结果又获得丰收。胡学章摸索出的新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明显好转。

土改后分得了土地的部分农户劳力多，缺畜力和农具；部分户车辆、牲畜全，但缺少劳力。一到农忙季节，矛盾便显得特别突出了。劳力多的农户，往往由于缺少畜力车具而着急；有畜力农具的户，受劳力限制，只好看着牲畜农具瞪眼。胡学章属于前一种情况，常常因为借不到牲口耽误送粪犁地。他根据过去互帮互助的经验，萌发了把这两种农户的优势结合起来的想法。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1950年7月，胡学章联系薛同福、胡学理、薛全庆劳力多的贫农户和胡中华、薛奎元有牲畜农具但缺劳力的农户，率先组成了长葛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全组4户贫农，2户中农，38口人，16个半劳力，57.2亩土地，3头牛，大小车各一辆，两个烟炕，犁耙耩各一张。互助组属临时性的自愿结合，农忙时集中耕地种植，集中收获，大户带小户，人力换畜力，互相帮助，工效大增，解决了农忙时缺少人力、畜力的困难。

胡学章互助组实行统一安排农活，统一调配人力、畜力。如第二天需要犁地，用谁家牲口犁具，谁家出劳力，头天晚上提前安排好。牲口不中，要

搭配劳力，也提前安排好。麦子成熟，哪家先熟先收那家的。收割的麦子分户垛到自己家的场里，再按顺序统一碾场收打。

互助组农户中，多数贫农地里没井。一到旱天，庄稼常常因为浇不上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为了发展生产，胡学章说服互助组成员，组织打井。当时因为水位浅，都是用人力挖井。一般挖一眼土井需4个劳力，二人轮流在下边挖，二人轮流在上面摇辘轳提土，三天左右就能挖成。井挖好后用辘轳浇地，一个劳力一天能浇1到2亩地，基本上解决了组内农民浇地问题。

互助组农户间团结和睦，不仅生产互助，而且生活上也互相帮助。比如修缮房屋就是如此。当时大多数农户住的是用麦秸做屋顶的草房，这种房顶三至五年就要翻修一次。胡学章带领户主查看房子，看谁家的房顶需要修缮，按轻重缓急作出计划，然后在收麦时安排每户准备三到五百斤麦茬，集中起来翻修房顶。翻修下来的草土分到各户作肥料。从1950年到1953年3年间，共翻修房子6所，解决了部分农户的住房问题。

在互助组的发展过程中，胡学章特别注重吸收贫困户。为了帮助这些贫困户加入进来，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贫农胡少锁，全家五口人，缺劳力牲畜，地里又无井，生活十分困难。开始提出让他家加入互助组，大家都不同意。胡学章挨家挨户说服动员，耐心地开导：都是穷人过来的，都知道穷日子难过，咱能过下去，不能丢下他一家不管。在他的说服劝导下，大家终于同意他加入互助组，并帮助他在地里打了井，为他家翻修了房屋，感动得胡少锁全家热泪盈眶。

胡学章互助组逐年发展壮大，由6户发展到16户，粮食生产稳步发展，1952年秋粮亩产增收50斤，全组共增收1835斤，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互助组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直到1953年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止。

胡学章同志是解放初期长葛县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曾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他虽然病故18年了，但他工作积极、吃苦在前、办事公道、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高尚品德和良好作风仍然受到当地人民的深刻怀念。

1999年8月脱稿

长葛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程廉清 张水旺 马普业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特别是长葛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对当时发展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了解第一个初级社的情况，我们邀请健在的当年创办初级社的老人郑绍卿、王合臣、郑丙甲等进行座谈回忆，现根据笔录整理如下。

1950年土改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耩、犁、车、耙等大件农具，少这没那，耩地时连张耩都借不来，生产非常困难。1951年春，党组织大张旗鼓地宣传走集体化道路的好处，号召我们组织起来。俺洼张村是个穷庄，过去种地就有人力换工，牲口搁犊的习惯。郑修堂、王成恩、王恩科、郑青、郑五妮和张山6户多年合伙做刮烟丝生意，是郑修堂的领家。有一天修堂找我说：合臣，就你独个，您七奶奶是个孤寡老婆，咱们组织到一块，你干活，她给你做饭，咱们成立互助组，中不中？我说中。接着他又去动员王玉兴，玉兴也愿意，说干就干。以郑修堂领的刮烟丝户为老底，俺这9户成立了互助组，有8个劳力，1头牲口。大家齐心协力，麦收的快，秋种得比单干户早，庄稼长得也好，秋季粮食丰收了。当时郑绍卿也领了4户组成的互助组。修堂和绍卿商量，您那组小，力量小，联合起来力量大，入俺的组吧，郑绍卿同意了。互助组扩大到13户，劳力也多了，有两头牲口，3辆大车。1951年夏季天旱，俺挖土井浇地。那时水浅，上午去两个劳力挖井，下午带上轱辘，就能提水浇庄稼、栽红薯。人心齐，干得好，粮食增产了。上级为了支持我们发展，石固街南北寨学校厕所里的粪指定叫俺拉。供销社弄的肥田粉优先卖给俺。粪肥多了，打的粮食也多了。这时候互助组成了先进典型，那时真光荣。1951年6月，郑修堂、郑绍卿、张留庆参加了县里表模会。1952年郑修堂又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上级奖励双铧犁、锦旗，还有一匹马，这时互助组已经有了集体财产，有了公共积累。

根据条件，1953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初六），召开大会，上级宣布成立长葛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石固区宗庄乡郑修堂增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社里有15户，36个劳力，5头牲畜。初级社规模逐年扩大，最后发展到50户，300多口人，80多个劳力，400多亩土地，6辆大

车，13头牲口。郑修堂任社长、妇女干部郑清香、会计郑丙甲、保管王玉兴、饲养股长郑殿东，这算俺社的五大干部。同时还选出了4个饲养员，牲口合槽喂养，有八寸步犁、双铧犁、马拉收割机等大件农具。初级社管理实行土地、牲口、大件农具都作价入股，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劳力根据能力、技术、思想、风格等条件评出底分，男劳力五至十分，女劳力四到八分。有记工员，日不错影记工，会计按季算分配帐。开始分配注重人头，实行人五劳五，即一半粮食按人头均分，一半粮食按工分多少分配。为调动劳动积极性，后来又实行人四劳六，人三劳七。生产组织分了三个组，每天晚上社里开组长以上干部会安排农活，讨论生产，啥事都是商量着来。社里一年两季评模范，把服从领导、有觉悟、干活质量好、数量多、团结互助、风格高等作为条件，买些铁锨、锄、镰、草帽、皮鞋作为奖品鼓励先进社员。那时宣传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开群众会宣传政策，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时，党组织在农村威望很高，干部联系群众，办事公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我们的初级社到1955年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郑修堂增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长葛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为推动互助合作化运动起到了示范作用。

（作者程廉清：长葛市粮食局干部；马普业石固镇文化专干。）

长葛人发明深翻改土的前前后后

胡大毛

1954年春，随着农业互助合作高潮的出现与发展，创办孟排村（原隶属后河乡，后划归坡胡人民公社）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胜利一社的农业社长、共产党员马同义同志，根据组织起来的农民要大力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提出要总结玉米高额丰产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设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此，马同义同志集思广益，多次召开“诸葛亮”会，到处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并反复深入田间观察，精心寻找农业增产的措施。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他从四个方面得到了启示：一是为什么填平的旧井坑上种的庄稼连续几年都比周围的强？二是平过的壕沟上种的庄稼为什么格外好？三是开过沟的葱茬地上种的庄稼为什么比邻边地长得粗壮？四是为什么用大锄深锄的地比浅锄的地耐旱耐涝？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使马同义同志坚定了一个信念——深翻土地一定能增产。

于是，马同义同志组织几个有经验的老农先在一亩二分地上作试验。开始，也有人不相信深翻土地能增产，说什么“巧打扮不如拙上粪”，“粪大水勤，不用问人。”但是马同义同志并不灰心，坚持进行试验。他们把土地深翻了一尺五寸，种上了“白马牙”玉米，经过适时追肥、浇水，精心管理，结果玉米长得秆粗棒（穗）大，籽粒饱，获得了亩产一千零七十三斤的高额丰产。从此，深翻增产的事实，更加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

马同义创造的深翻土地方法，当时经中国科学院和西北农学院土壤专家等权威人士的研究鉴定，一致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耕作法。这种深翻土地的方法是全面的、综合的、有原则性的，也是很科学、有秩序的。它的特点在于土地虽然翻得较深，但表层熟土仍然放置在表层，不会因为翻得深，生土影响作物的发育。逐层施肥，便于施入大量的肥料，使作物根系的生长范围扩大，便于杀虫灭草和蓄水保墒。尤其是充分灌溉的条件下，更能溶解肥料，显著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土壤专家熊毅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法定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

孟排村共产党员马同义同志带领农民群众创造深翻土地，促进农业增产的经验，立即引起县、乡党委的高度重视。县委专门派出工作组常驻该村具

体帮助他们总结、提高，使深翻改土的经验不断得以完善发展。同时，还采取运用典型、指导一般的工作方法，先后在这里多次召开现场会，组织全县各级干部群众学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并要求各地对多种作物搞深翻试验，结果普遍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如阎寨村的小麦等，未深翻的单产五百零七斤，深翻后单产六百一十七斤，增产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石桥刘村的早玉米，未深翻的单产五百一十三斤，深翻后单产七百四十九斤，增产百分之四十点七；孟排村的红薯，未深翻的单产三千一百斤，深翻后单产四千七百余斤，增产百分之五十一一点六；双庙村的烟叶，未深翻单产四百一十斤，深翻后单产五百二十斤，增产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孟排村曾在水肥同样比较充足的条件下（播种前施人底肥二万斤，管理期间追施硫酸铵四十斤，浇水三次）进行试验，播种的“阿夫”小麦等，同样精心管理，但是产量却大不一样，未深翻的亩产五百七十六斤六两，深翻的亩产八百四十五斤八两，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二。上述事实说明，在水、肥、种、管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深翻比不深翻的普遍获得增产。多的增产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少的也增产百分之十几。

全县党员干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以马同义同志为学习榜样，在生产实践中，还根据土质、季节、作物、劳力等不同条件创造出十种科学的深翻方法：①人工普通翻（农民称为鹁子大翻身）。②人工沟翻条播。③双层深耕犁普遍翻。④前犁后耩法（又名人畜力结合深翻法）。⑤前犁后套深耕法。⑥三犁冲脊深耕法。⑦坑翻窝种（又名一生隔一熟，种后深锄翻土法）。⑧单层深翻犁普遍法。⑨生土不动，活土搬家深翻法。⑩结合熏肥深翻法。

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深翻土地有十大好处：①可以风化土壤，使死土变活土，活土变油土，加深了土壤的肥沃层，增强了土壤的团粒结构；②松土层加深，便于根系发育；③能增强蓄水能力，保墒防旱；④能充分发挥肥料的效能；⑤减少地面径流，防止内涝；⑥土地成畦，便于灌溉；⑦能根除杂草；⑧可以消灭虫害；⑨土壤松动，便于平整；⑩能使作物扎根深，增强抗风能力。

当广大群众认识了深翻土地的好处以后，深翻土地就很快变成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但是，开始时完全是用人工一锹一锹的翻，每人每天只能翻一分半到二分，虽然质量好，但是费工太多，劳动强度太大，加之生产任务大劳力不足，怎么办？广大群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献计献策，出现了农具改革运动的高潮。在这个热潮中，不仅创造发明了各种提水、运输、积肥和农副业产品加工等工具，而且也发明了深翻土地的工具。和尚桥首先创造出人力畜力结合翻地的方法，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紧接着增福庙乡先进一社社员王玉顺创造了一种双层铧深耕犁，两头牲

口，一人操作，每天可翻地三亩，深度一尺五寸。此外，还创造了各种深翻土的犁。这样就为减轻劳动强度，加快深翻土地的进度创造了条件。

地委、省委直至党中央、毛主席对我县兴起的深耕土地群众运动非常关怀和支持，曾多次在我县召开深翻土地、耕作园田化现场会议，总结交流经验，鼓舞全县人民不断前进。尤其令人永远难忘的是，1958年5月4日，原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同志作为河南省先进县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17日，吕炳光同志代表全县人民在会议上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了我县深翻改土夺取农业丰收的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面仔细听发言，一面兴致勃勃地在发言稿上勾划。发言结束后，当天，毛主席在向大会作重要讲话时，对吕炳光同志的发言作了高度评价，非常高兴地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并赞扬这是一大发明。同年8月7日，毛主席主席亲临我县视察，又详细地询问了深翻土地的情况。9月，视察大江南北时，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伟大号召。

毛主席对长葛人民创造深翻土地作了高度评价之后，农业部派六名高级农业科技人员及土壤专家直接进驻我县孟排村从理论到实践的相结合上，帮助总结深翻土地的系统经验。1958年8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县召开了土地深翻、土壤改良、工具改革现场观摩会议，随后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派代表到我县参观学习。孟排村马同义等深翻土地的“土专家”也被一些省、市、县请去作深翻土地的指导工作。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聘请马同义为特级土壤研究员，中央各新闻、出版单位作了大量宣传报导，《人民日报》于当年5月13日全文登载了原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中央农业权威性杂志《农村工作通讯》第8期以专栏形式，一次登载四篇近两万字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长葛深翻改土的经验；《农业技术》、《旅行家》等杂志也分别选登了经验文章。1959年秋，中国农业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深翻土地》一书，发行了三万五千余册，从而长葛深翻改土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

1958年以前，全县上下虽然尝到了深翻改土的甜头，但只是一般地把它当成一项农业增产措施，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它在农业增产中的重要地位。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看完了我县深翻改土的经验，号召全党学习土壤学，并明确指出：增产粮食，要靠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心是土，有土才有粮，应该把土放在前边，其次是肥、水。联系我县深翻改土，夺取农业丰收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深翻改土的指示正确

地揭示了农业增产的客观规律，是改良土壤的好方法。不深翻改土，水肥再多也不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群众的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把“土”字升到农业“八字宪法”的首位，实在是天公地道。认识提高了，思想统一了，县委提出：以深翻改土带水肥，以水肥促深翻改土，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促进农业增产。并制定了每三至四年把全县耕地轮翻一遍的计划。为了认真落实毛主席深翻改土的重要指示，实现县委的规划，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在深翻改土方面不断创出新经验，县委及时总结了平原地区的孟排、半山区的芝芳、丘岭地区的耿庄、沙岗盐碱地区的和尚杨等大队不同类型深翻改土的经验，向全县推广。从山区到平原，从沙岗到洼地，到处都摆开了深翻改土的战场，平原地区，深翻结合平整，实现园田化，建设高产稳产田；半山区，深翻结合治山，创造了砂礓地大开膛，先把表层熟土翻一旁，然后好土再封上的建设梯田的经验；丘岭岗地，深翻结合治岗，好土不动，死土搬家，削岗平地，填沟造田；沙岗盐碱地，深翻结合治沙治碱，翻淤压沙，搬岗压沙，挖沟排水，渗水沥碱、随着深翻改土的深入发展，我县官亭大队又创造了机引深耕犁，使深翻改土由手工开始向机械化进军。

实践证明：深翻改土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它决不是孤立的，是与农业“八字宪法”其它几个环节紧密相联系着的。在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夺取农业丰收的实践中，广大农民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土是根，肥是劲，水是命，种是本，密、保；管、工要紧跟。‘八字宪法’是个宝，‘土’字又是宝中宝，八项措施结合好，生产一定大提高。”

勤劳智慧的长葛人创造深翻改土的过程和各种新生事物出现、成长、发展的过程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正当全县深翻土地的热潮蓬勃发展的时候，遇到的最大思想障碍是“左”倾错误的干扰，出现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粪大水足，地翻五尺，要不增产，太阳出西”等违背客观实际的言论，极少数受其影响严重的人还在个别地块上付出很大代价，翻土翻得很深，打乱了土层，不仅没有增产，反而造成减产，干出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蠢事。后来通过批判左倾冒进，纠正“五风”错误，不仅很快得到了扭转，而且坏事变成了好事。以此为戒，通过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既增强了全县人抵御左倾错误的的能力，又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学科学、用科学、普及科学知识的自觉性，为长葛县坚持深翻改土，实行科学种田，促进粮食连年稳产高产，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作者胡大毛：曾任长葛市政研室主任）